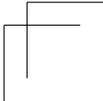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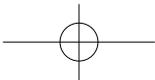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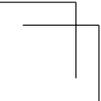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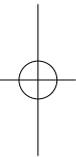


一、
導
論



良民宗教 (The Religion of Good-citizenship)

難道這樣做有什麼不對嗎？群眾，我們不能不愚弄他們；

你瞧，他們多麼笨拙無能！看上去多麼野蠻！

所有亞當的子民被愚弄之時，

都是笨拙無能和野蠻的，

惟有真誠，才能使其煥發人性。[1]

——歌德

目前的這場大戰，正把世界人民的注意力從其他一切事情上吸引過來。然而，我認為，這場戰爭本身，必須引起人們對文明這個大問題的關注，並對此進行嚴肅認真的思考。一切文明都起源於對自然的征服，即，通過征服和控制自然界可怕物質力量，使人類免受其害。必須承認，今日歐洲的現代文明在征服自然方面的確取得了成功，而且迄今為止，尚沒有任何別的文明能達到這一點。但是，在這個世界上，除了自然力，還存在有一種較自然力更可怕的力量，那就是蘊藏於人心的情欲。自然界的物質力量對人類所能造成的傷害，是沒法與人類情欲所造成的傷害相比的。毫無疑問，如果這一力量——人類情欲——不予以調控的話，那麼不僅無所謂文明存在之可言，而且人類的生存也是不可能的。

在人類社會的始初階段，人們不得不用物質力量來壓抑和克制其內心的情欲，這樣，原始人群就不得不受制於純粹的物質力。但隨著文明的進步，人類逐漸發現，在征服和控制人類情欲方面，還有

一種比物質力更加強大和更加有效的力量名之曰道德力。在過去的歐洲，這種曾有效地征服和控制人們情欲的道德力是基督教。可如今這場血腥的戰爭已超越了它，它似乎已經表明，基督教作為一種道德力量已然失去了效用。因缺乏一種有效的道德力去控制和約束人們的情欲，於是歐洲人民又不得不重新採用物質力量來維持社會秩序，恰如卡萊爾^[2]一語所道破的，目前的歐洲「是混亂加上一支來福槍」。這種為維持秩序而對物質力量的利用，導致了軍國主義。實際上，在今日歐洲，軍國主義是必要的，因為它缺乏一種有效的道德力量。可是，軍國主義導致戰爭，而戰爭就意味着破壞和毀滅，這樣，歐洲人民便被逼迫到了這樣的兩難絕境：如果他們要擺脫軍國主義，混亂就將破壞他們的文明，假如他們要持續軍國主義，那麼其文明又將經由戰爭的浪費和毀滅而走向崩潰。然而，英國人說他們正決心打倒普魯士軍國主義，基齊勒勳爵^[3]相信他以三百萬訓練有素的軍隊是能夠搗碎普魯士軍國主義的。可是，在我看來，即使普魯士軍國主義真的就這樣被搗碎了，那麼繼之而起的不過是另一個軍國主義——我們又不得不予以搗碎的英國軍國主義罷了。而這樣，似乎就沒有辦法能擺脫此種惡性循環。

可是，真的就不存在可以擺脫的辦法嗎？不，我相信有的，美國人愛默生曾經說過：「我能夠輕易地看到庸俗卑鄙的滑膛槍崇拜的破產——儘管大人們都是些滑膛槍崇拜者；正如上帝存在一樣，毫無疑問不能以槍易槍，惟有以愛和正義的法則，方能導致一場乾淨的革命。」現在，歐洲人民如果真的要推倒軍國主義，那麼他們就只能採用一種行動方式，即用愛默生所說的不以槍易槍，而只能以愛和正義的法則去做——實際上，就是訴諸道德力量。擁有一種有效的道德力量，軍國主義就會變得沒有必要從而自行消亡。可是問題在於，現在基督教作為一種道德力量已喪失其效用，在這種情況下，歐洲人民

何處尋找這種取代軍國主義的新的有效的道德力量呢？

我相信，歐洲人民會在中國——在中國的文明裡找到它。中國文明中的這種使軍國主義失去必要性的道德力量，便是「良民宗教」。可是，人們會問我：「在中國不也存在戰爭嗎？」

的確，在中國是存在戰爭的，不過自從兩千五百年以前孔子的時代開始，我們中國人就沒有發生過像今天在歐洲所看到的那種軍國主義。在中國，戰爭是一種意外事故（accident），可是在歐洲，戰爭則是一種必需（necessity）。我們中國人是會打仗的，但是我們並不生活在戰爭渴望之中。實際上，在我看來，歐洲國家最不能讓人容忍的一件事，並不在於他們有如此多的戰爭，而在於他們每個人都總擔心其鄰居一旦強大到一定程度，就要來搶奪他和謀害他。因此他自己便趕緊武裝起來或者雇用一個武裝員警來保護他，這樣，壓在歐洲人身上的便不是如此多的戰爭，而是不斷地武裝自己的需要，一種必須利用物質力量來保護他們自己的絕對的需要。

但是，在中國，因為我們中國人有良民宗教，所以，每個人都並不感到有用物質力量來保護自身的必要。他甚至於都不叫員警或用類似員警這種物質力量來維護他自己的利益。在中國，一個人受到他鄰居的正義感之保護、受到他同事出於道德義務感的自覺自願的保護。實際上，在中國，每個個體之所以不感到有用物質力量保護自己的必要，是因為他確信公理和正義被公認為一種高於物質力的力量，而道德責任感則被公認為一種必須服從的東西。現在，如果你能讓全世界都承認公理和正義為一種高於物質力的力量，道德責任感為人們所必須服從的東西，那麼，利用物質力量維持社會秩序就會變得沒有必要，而這個世界也就不會有什麼軍國主義了。當然，每個國家都總會有一小撮人，犯罪分子，世界上也

會有少數野蠻人、暴徒將不會認可公理和正義為一種高於物質力的力量，不會承認道德責任感為一種必須服從的東西的。因此，為鎮壓罪犯和野蠻暴徒起見，一定數量的物質力或員警武力、乃至軍國主義的存在，在世界上，在各個國家也都總還是必要的。

然而，人們又會問我，你將如何使得人類承認公理和正義為一種高於物質力的力量呢？我的回答是，你必須首先使人類確信公理和正義的功效，使他們確信公理和正義乃是一種力量，實際上，就是使他們相信善的力量。然而你將怎麼實現這一點呢？好，我告訴你：要做到這一點，中國的良民宗教，在每個小孩剛能識字的時候，就教給他一句話：「人之初，性本善」。^[4]

我認為，今日歐洲文明的基本謬誤，正根源於對於人性的錯誤認識，即根源於人性本惡的觀念，因為這種錯誤的觀念，歐洲的整個社會結構總要依賴於武力來維繫。在歐洲，人們賴以維持社會秩序的有兩樣東西：一是宗教，再是法律，換言之，歐洲人民所以就範於秩序，主要依靠對上帝的敬畏和對法律的畏懼。這裡畏懼本身就意味著強權的使用。而為了保持對上帝的敬畏，歐洲人民不得不養活一大批奢侈而又遊手好閒之輩名曰教士，不說別的，僅就其意味著的巨大奢侈而言，它最終就足以變成歐洲人民不堪忍受的重累。實際上，三十年宗教戰爭，就是歐洲人民意欲擺脫教士的舉動。在擺脫通過敬畏上帝來維持秩序的教士之後，歐洲人民又試圖通過畏懼法律來維持社會秩序，可是，要保持對法律的畏懼，歐洲人又不得不養活另一個更加奢侈浪費和遊手好閒的階層名曰軍警。現在，歐洲人民又開始發現用軍警來維持秩序，甚至於比用教士還具災難性。事實上，正如同在三十年戰爭中歐洲人民想要擺脫教士一樣，在目前的這場戰爭中，歐洲人民真正要做的，是要擺脫軍警。可是，如果歐洲人民意欲擺脫軍

警，那麼擺在他們面前的選擇，要麼就是重新召回教士以喚起人們對上帝的敬畏，要麼就是去尋找另一種別的東西，像敬畏上帝和畏懼法律一樣，幫助其維持社會秩序。我想，如果把問題放在更廣闊的背景中去，大家都會承認，這就是戰後擺在歐洲人民面前的一個巨大的文明難題。

現在，已經有過教士統治教訓的歐洲人，是不會願意召回那些教士的。俾斯麥就說過：「我們絕不回到卡諾沙。」^[5]況且，現在即使那些教士們被召回，也實在無濟於事。因為歐洲人對上帝的敬畏之心早已消失殆盡了。所以說，歐洲人民如果想要擺脫軍警，那麼擺在他們面前的就僅存另一選擇，即須求得一樣東西，能像對上帝的敬畏和對法律的畏懼一樣幫助他們維持秩序。我相信，在目前，這種東西，正如我在前面所提過的，歐洲人民將在中國找到它，這就是我所謂的良民宗教。中國的此種良民宗教，是一種不需教士和軍警就能保證全國秩序的宗教。事實證明，由於擁有這種良民宗教，廣大的中國人民，這個人口即使不比整個歐洲大陸人口眾多，至少也和其不相上下的民族，在實際上和實踐上，沒有教士和軍警，卻始終保持著和平與秩序。凡是生活在中國的人都知道，那些教士和軍警，在幫助維持公共秩序方面只起極其不明顯的、微不足道的的作用。在中國，只有最愚昧無知的階層才需要教士，只有那最邪惡的罪犯階層才需要軍警。所以我說，歐洲人民如果真想擺脫給他們帶來無窮災難和流血的教士與軍警，他們就將不得不來到中國，取回這種我所謂的良民宗教。

簡而言之，我要喚起歐美人注意的是，值此文明瀕臨破產的關頭，在中國這兒，卻存有一筆無法估價的、迄今為止毋庸置疑的文明財富。這筆財富不是該國的貿易、鐵路，也不是該國的礦藏、金銀鐵或煤之類。在此，我要指出的是，這筆文明的寶藏，正是中國人——那擁有良民宗教且尚未遭到毀滅

的真正的中國人。這真正的中國人，我說，他是一筆文明的財富，是因為他作為一個人，只花銷這個世界極少或幾乎不花費什麼，就能規規矩矩就身秩序。確實，在此我倒願意警告那些歐美人，不要去毀滅這筆文明的財寶，不要去改變和糟蹋那真正的中國人——就像他們今天正努力以他們的「新學」(New Learning)所做的事情那樣。如果歐美成功地破壞了真正的中國人、那中國式的人，且成功地把他變成一種歐美人，也就是說，將其變成一種需要教士和軍警才能就身秩序的人，那麼無疑地，他們將為這個世界徒增宗教、抑或軍國主義的重累罷了——而這後者在目前已正變成對於文明和人性的一種危險和威脅。然而，從另一方面想，如果能通過某種途徑或手段，來改變歐美式的人，將歐美人變作不需要教士和軍警便能就身秩序的真正中國人，那麼可以預料，世界將為此而擺脫一種多麼沉重的負擔。

下面，我想就這次大戰中在歐洲凸顯出來的巨大的文明難題，做幾句簡明的概括。我認為，歐洲人民，起初是試圖借助教士來維持社會秩序，但不久，由於教士的奢侈無度並造成沉重的負擔，歐洲人民在後來的三十年戰爭中，送走了他們，接著便招進了軍警來維持社會。可是現在，他們又發現軍警導致的奢侈浪費和災難甚至於遠遠超過教士。對此，歐洲人民將如何是好呢？是送走軍士，再召回教士嗎？不！我認為歐洲人民是不願再召回教士的，即使召回他們也無濟於事。那麼，歐洲人民究竟該如何是好呢？在《大西洋月刊》上，我曾看到劍橋的迪金遜^[6]教授的一篇題為《戰爭和戰爭的出路》的文章，他說要「招進群氓」。可我恐怕招進群氓來代替教士和軍警，將會給人們帶來比前者更大的災難。在歐洲，教士和軍警導致了戰爭，而群氓則將帶來革命和混亂，且後者比前者還要糟。因此，現在我對歐洲人民的勸告是，不要召回教士，為了善的緣故也不要招進群氓——而只需招進中國人，招進那擁有良民

宗教、歷經兩千五百年之久用不著教士和軍警，卻生活在和平之中的真正的中國人。

實際上，我的確相信，歐洲人民於這場大戰之後，將在中國這兒，找到他們解決戰後文明難題的鑰匙。我再說一遍，正是在中國，存在一筆無法估價的、迄今為止毋庸置疑的巨大的文明財富。這筆財富，就是真正的中國人。因為他擁有歐洲人民戰後重建新文明的奧秘，而這種新文明的奧秘就是我所謂良民宗教。這種良民宗教的第一條原則是，要相信人性本身是善的；相信善的力量；相信美國人愛默生所說的愛和正義的法則之力量與效用。可是，什麼是愛的法則呢？良民宗教教導人們，愛的法則就是要愛你的父母。那麼，什麼又是正義的法則呢？良民宗教告誡人們，正義的法則就是要真實、可信、忠誠。每個婦人必須無私地絕對地忠誠其丈夫，每個男人必須無私地絕對地忠誠其君主、國王或皇帝。在此，我想最後指出，這種良民宗教的最高責任，就是忠誠之責任（Duty of Loyalty），忠誠，不僅表現在行事上，而且蘊藏於內心，或如丁尼生⁽¹⁾所言：

尊國王兮如良心，
敬良心兮似國王，
破異教兮崇基督。

註釋：

- [1] 譯註：原文為：
Sage, thun wir nicht recht? Wir müssen den Pöbel betrügen,
Sich nur, Wie ungeschickt, sieh nur wie wild er sich zeigt!
Ungeschick und wild sind alle rohen Betrogenen;
Seid nur redlich und führt ihn Zum Menschlichen an.
- [2] 譯註：卡萊爾 (Thomas Carlyle, 1975-1881)：十九世紀英國傑出的思想家、預言家、文學家和史學家，浪漫主義思潮的主要代表。他強烈譴責資本主義社會弊端和文明缺陷，是對辜鴻銘思想影響最大的西方人之一。據說辜氏在愛丁堡大學留學時，卡萊爾正是他的導師。
- [3] 譯註：基齊勒 (H. H. Kitchner, 1850-1916)，英國陸軍元帥，曾鎮壓布林人的起義。
- [4] 在中國，每個小孩剛上學時，交到他手裡的第一本書的第一句話，就是這句。
- [5] 譯註：卡諾沙 (Canossa)：義大利北部的古城堡（在今勒吉奧 (Reggio) 附近卡諾沙村）。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因同羅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爭奪主教繼任權，被後者開除教籍，帝國境內諸侯乘機叛離。一〇七七年一月，亨利被迫冒著風雪嚴寒，翻越阿爾卑斯山到卡諾沙向「教皇悔罪」。據載，亨利身著罪衣，立於城堡門口三晝夜，始得教皇赦免。後來「往卡諾沙去」成為屈辱投降的同義語。但辜鴻銘這裡有意指回歸教士統治時代。
- [6] 譯註：迪金遜 (Lowes Dickinson, 1862-1932)：英國學者。曾著《中國佬約翰來書》，批評西方近代文明，讚賞中國文化，一舉成名。書中的觀點與辜鴻銘的思想頗為相似。後為劍橋大學教授，曾來華遊歷。
- [7] 譯註：丁尼生 (Alfred Tennyson, 1809-1892) 英國詩人。一八五〇年發表詩集《悼念》，得到女王賞識，被封為「桂冠詩人」，作品格律嚴謹，聲調和諧，被認為是維多利亞時代最傑出的詩人。

二、中國人的精神